

浅论金庸武侠小说与两种“现代性”意识

王 乐*

目 录

- 一、引言
- 二、两种“现代性”的意识
- 三、结语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金庸热”与金庸研究逐步地在大陆展开，影响甚广；及至90年代，随着文学观念和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雅俗文学的分界淡化，文学史的整体格局渐趋多元化，金庸武侠小说开始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严家炎在金庸受聘典礼上，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讲话，认为金庸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严家炎的发言还只是一次提示，而王一川则做出了“颠覆教科书”的尝试，他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习惯座次“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小说家茅盾落选。此后，一大批研究者将金庸研究不断引入大学课堂，并有定期召开的金庸武侠小说国际文学研讨会等。自此，金庸武侠小说研究（“金学”）进入了一个体系化学术研究阶段。

从文体上说，金庸武侠小说沿袭的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从题材上

* 韩国外国语大学 博士在读 韩国大真大学 专任讲师 shiranmao@hotmail.com

看，金庸小说的武侠题材属于古代历史书写的范畴；从主题上看，金庸小说所宣扬的“侠义江湖”属于传统阅读的审美范畴。如何将这一古典范畴的小说纳入现代性的文学视野和文学版图之中，各方研究者均从各自的视角进行过诸多的研究与争论；诸多的研究者都在为将金庸武侠小说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的版图而努力，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同现代启蒙作家一道，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建构，并充分论证其小说创作方式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文体形式变化上的现代特点。本文首先拟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梳理，从研究现状认清这一金庸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的已有成就，从而为下一步的研究做好准备。

1. 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文化：

鉴于金庸武侠小说本身的文体和主题特点，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现代性价值的肯定，无疑是从承认其小说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沿革来看待的。在这方面率先提出的是金庸小说研究亲和力最大的陈墨¹⁾。他提出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其作者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思考者、批判者、表现者和塑造者，他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详细地列举了金庸武侠小说文本中涉及到的传统中国文化现象。上卷“文化知识录”，陈墨从史、地、易、儒、佛、道、兵、典、政、武、医、诗、琴、棋、书、画、花、酒、食、俗切入金庸，下卷“文化精神论”中，陈墨则从传奇、侠盗、王霸、功利、人神、名教、忠孝、男女、佛道、智愚、汉夷、生存观照金庸，多有精彩之论。

1) 陈墨目前已经出版了12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著作，包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金学研究系列”。有《金庸小说赏析》（1990），《金庸小说之谜》（1992）《金庸小说人论》（1994），《金庸小说艺术论》（1994），《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1995），《金庸小说之武学》（1996），《金庸小说情爱论》（1996）；此外，还出版有上海三联书店的《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1999），《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2001），《英华之咀——金庸四部佳作回评》（2002）；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武林文宗·金庸》（1998）。等等。

2. 金庸武侠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要承认金庸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框架中的合理性和发展性，首先得越过中国现代文学已有文学史结构中的“雅”与“俗”问题。在上世纪新文学发生之初，武侠小说与其他俗文学一道被打入了现代文学的另册，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口号喊出了“将文学作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然，武侠小说之类的东西归入了不属于“为人生”的一类。随着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对既有文学史格局的反思，这一“雅俗对峙”的文学史格局开始松动，文学史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正好为之后的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现代性地位提供了条件。北京大学的教授严家炎曾在1995年春为本科生开讲“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并根据讲稿整理而成《金庸小说论稿》²⁾一书，严家炎以文学史家的眼光，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了侠文化的作用，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

吴秀明、陈择纲在《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一文，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认为这种现代性是金庸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文类的陈旧落后思想的一次革命性改造。³⁾

3. 金庸武侠小说与现代叙事形式：

研究者从现代叙事学的理论和视角出发，仔细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跟同步发展的现代文学之间的横向联系，在其传统叙事模式的背后，渗入了更多现代性的叙事技巧和方法：如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得力于戏剧、电

2)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3) 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杭州大学学报》，1997 (4)

影尤多。戏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说场面和人物调度的舞台化，电影的影响表现在笔墨描写的视觉化和场景组接的蒙太奇化。影剧式技巧的运用，使金庸创造了一种新的武侠文体。⁴⁾

袁杰认为金庸小说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文章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了探索。⁵⁾

4. 金庸武侠小说与最新西方文化批判理论：

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更趋向于运用最新的西方理论方法对文学文本做文化批判意义上的分析，以此来挖掘文本背后深层的“文本”与“历史”之间的生成过程以及重新解读文本深层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宋伟杰的博士论文《从娱乐行为到与乌托邦冲动》分析了金庸小说的娱乐性背后潜藏着的现代性意味。他借助新兴的、具有科际整合意味的“文化研究”策略，揭示了金庸小说中潜藏的批判现实的乌托邦冲动。⁶⁾

5. 金庸武侠小说与接受美学：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20世纪的接受美学的理论视野，充分论证了金庸武侠小说在阅读层面的现代性本质：如赵跃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指出：20年来，大陆对金庸小说的阅读接受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大陆的接受分为80年代的民间接受和90年代的学术界接受，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他们的接受表现

4) 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5) 袁杰，《试论金庸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1）。

6)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与乌托邦冲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民间在于娱乐消遣功能的取舍,学术界则是试图在审美定位中重构新时期的中国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又由于金庸小说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嬗变以及对现代社会人生、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所形成,它自身的文化意蕴和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⁷⁾

通过以上五点可以看出,研究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认识普遍强调了其现代性的一面,努力阐释和论证了其小说内在的品格跟表面的主题范畴和文体形式的传统性之间的差异性。他们要么承认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和生活的书写及想像具有革新和超越性;要么承认其书写方式完全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体系之内;或者承认其传统的小说文体形式内部已经包含了新的现代叙事形式;更有甚者,研究者运用最新的西方理论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再解读”方式,以此来论证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有着更为独特的文本意义和接受策略,超越了早期单纯的“古典武侠小说”的阅读方式。

已有这些研究成果均是从各自独特的视角来肯定金庸武侠小说的某一现代性品格。然而,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种更为整体性的现代性阐释方案。通过引入一些关于“现代性”的经典理论概述,来全面性地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学思想价值上体现出的“现代性方案”。并以此现代性理论视野为参照,将金庸武侠小说纳入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历史的框架之中,从而指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具有更多的社会时代内涵及现代历史反思性。

二、两种“现代性”的意识

“现代性”不但是文学界在关注,而且是整个学术界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个概念,并且是许多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非常模糊且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各个学科以及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们都对现代性有着不一样的解读。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

7) 赵跃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金庸小说》,《保山师专学报》,2005(6)。

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登斯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现代性的“风险”、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性。

在文学的现代性理论方面，伊夫·瓦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对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全面的概括定义之后总结道：“我们面前存在两种现代性的概念，一种概念主要具有肯定意义，它把现代性当作进步所依赖的历史背景，而另一种概念则具有根本的否定意义，它认为现代社会的动力与真正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两者都必须依靠‘现代性’和一般历史运动之间的一种必然关系。”⁸⁾

1. “人的现代性”和创作思想的现代性

恰如所言，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这种对现代变革的进步动力的探索，从新文化运动到启蒙文学，再到革命文学，最后到社会主义文学，现代文学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断前进的；同时，从白话文运动开始，到现代文学经典的不断产生，均是伴随着对国民性的探讨、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的思想内涵，以及现代文学语言和形式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步伐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同步而来。现代文学史家也正是秉承着这一文学史进步的叙述逻辑充分展开的。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是这样给文学的“现代”性定义的：“‘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文学现代化”历程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⁹⁾。金庸武侠小说正体现出现代人或特定的现代香港人的现代思想观念，它对现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层面的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

而远在异地香港的金庸也同样深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念的影响，在他的

8) [法]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33.

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武侠小说创作中一直高扬着现代“人”的观念，强调人的独立、正义和自由的精神，把人从几千年传统习俗形成的伦理规则中解放出来。从人性、人道的角度出发来评价一切善恶、是非、恩怨。小说中首先反对的是传统社会制定的一切正邪、善恶、恩怨标准。反对任意杀戮，“快意恩仇”，对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标准提出质疑与反思。如《笑傲江湖》中所谓的正派人士对邪派人士的剿杀，《天龙八部》中汉族人对异族人的杀戮，以及《雪山飞狐》中父辈留下的冤冤相报等。那种任意践踏生命，不讲人道的传统观念，是对社会，对人类的极度破坏。故金庸小说中突出了侠客的“正义”行为。这种“正义”不是无原则的江湖义气，而是超越于江湖社会纷争之上的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平等观念的承认；是抛却了所有约定俗成观念的现代“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所以，令狐冲、乔峰、胡一刀、张无忌等众多侠客均能超越于正邪观念、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冤冤相报的复仇圈套，而以卓然独立的行为方式驰骋江湖，平息武林风波。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太平安康的理想化武林社会。一如衡山派刘正风与魔教长老曲洋合奏的一曲《笑傲江湖》，这其中既包含作者对现代社会政党、观念、意识及斗争的反思，又寄寓了现代理想社会的渴望。《笑傲江湖》（第六章）里刘正风、岳不群、丁勉、费彬的对话场景，虽是古典江湖人物与场景，但其语言方式及逻辑习惯无不与现代人相合：

这里且不说金庸小说中精确的对话语言和表情描写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如刘正风的忍、岳不群的伪、丁勉的狂、费彬的奸；只就这一场关系到正邪、善恶、真伪、强弱、阴阳等诸种关系的生动场景，就向读者深刻地演绎了从古代的政治阴谋到现代社会的利益斗争的尽数世相。这不仅体现了金庸武侠小说写作手法上的成熟，而且更体现出作者对社会时代的深刻反思力度。

比之于刘正风那种深谙社会世故的隐忍，我们从令狐冲、杨过等身上更可看出现代个性的张扬。他们不羁礼俗，自由放荡。令狐冲可与魔教圣姑结成伉俪，杨过可跟姑姑小龙女师徒合璧，只要两情相悦、彼此忠贞，其他所有的社会礼俗和世人偏见均可置之度外。这正是对生命个体独立性的尊重，是真正摆脱传统伦理依附的现代人的精神追求。这些都与五四以来反封建礼教、高扬人

道主义旗帜的“启蒙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传统化的情节构制中蕴藏一种现代性的反思力度。

与此同时，在其武侠小说中，金庸还深刻透视了人性当中的所有弱点和人性深处灵魂的创伤。正是因为人自身的复杂性和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很难分清金庸笔下的人物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不仅人会时常处于不同的境遇中，而且人物自身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多个矛盾层面，如这里面很多人物是亦正亦邪的，甚至还出现一些正义人士犯下过错，邪魔头做出善事的复杂情境。这种情况在金庸小说中非常常见。尤其突出的是，金庸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人性裂变、扭曲的人物形象，如因情而变的李莫愁、瑛姑，因仇而变的林平之、谢逊，因权利欲望而变的岳不群、任我行等等。金庸充分运用了现代心理学方法来剖析人物的心理，挖掘出人性深处灵魂的伤痛。所以说，金庸笔下的人物没有简单化、模式化，而是深刻地挖掘出人物性格背后的成因，塑造出一个个立体化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种对现代人的全新认识，它摆脱了以前武侠小说对人物认识类型化，观念化的束缚，完全成为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形态在其笔下人物内心的映照。还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小说中许多人物身世不明，身份难以确定，如石破天、韦小宝、乔峰、虚竹、令狐冲等。这些人物要么是孤儿，要么是陷于两种身份的辨别当中。这或许正是现代都市人茫然、彷徨感的写照，更寓示着现代香港人文化身份认同上存在危机的无根漂泊的心理。特别是小说中写到乔峰在追问自己的身世时，知情者一个个被杀，杀父仇人下落不明，感觉到有人在背后布下阴谋，却又不能查找真相，陷入了“无物之阵”。这时人物内心所体味到的那种遭人辱骂，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感和身世无从知晓的茫然感，正如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卡夫卡《诉讼》中的约瑟夫·K。这是现代人才能体会出来的一种独特而又典型的存在主义式心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见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参与了对现代人的改造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演变，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尤其是当他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以一种清醒的现代姿态和开放性的现代意识，对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进行现代式吸收和改造，重新建构了一个现代的武侠英雄世界。而他又不经意

堆砌思想观念的高度，不想对人的内心构成压力，在建构理想模式的同时又开始了新的解构。“从英雄到无赖，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¹⁰⁾在他后期武侠小说当中，如《侠客行》、《鹿鼎记》等，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创作思想。这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市民文学精神，又真正贯通了“以自己反对自己”的现代性反思精神。

另外，从创作方式本身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单纯地通过书写人物性格来诠释现代人的观念，以古典式的人物外表配上现代人的内在性格；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在特定的人物塑造上，金庸也同现代启蒙文学家一样，总是胶着在“启蒙者”与“文学家”的矛盾统一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启蒙者，其创作总是承担着一种社会时代的重任，将文学的“为人生”功用好好的贯彻下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学艺术家，其内在的创作潜质总是在追求一种特定的文体上的表现力和个体创作的自由。二者处于一种矛盾的胶着状态，从而形成了“现代文学”内在的创作动力，并凸显出文学文本内部的多层性。如唐杰的论文《金庸笔下黄蓉形象的文化解读》从评论界及一般读者对黄蓉形象的各种解说入手，在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中发现，黄蓉这一形象存在两个向度的分裂：其一，是从一个自私自利的邪女突变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女”；其二，是从叛逆任性的小妖女到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母性复归”。但是，无论是“突变还是复归”，都缺乏足够可信的承接与叙述。因此，该论文从作者金庸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创作中所面临的商业和艺术的矛盾，以及金庸潜意识中的传统男权思想与现代女性观念的冲突对黄蓉形象创作的影响。同时，又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了普通男女读者接受黄蓉这一形象的性别差异，最终发现黄蓉这一形象的分裂非但没有影响到读者对她的接受，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¹¹⁾显然，这种分析也正抓住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在利用小说人物塑造有意完成他的民族集体意识的责任的同时，发现了其艺术创作深层的那种文本缝隙，而这种文本裂痕又是如何通过大众与商业的传播又得以弥合的。

10) 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P272

11) 唐杰，《金庸笔下黄蓉形象的文化解读》，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另一篇研究论文中，研究者关士礼发现一个金庸小说人物塑造上的问题，说金庸笔下有两个典型的“儒家英雄”，被研究者普遍认为乔峰这个艺术形象很丰满而郭靖则很单薄。论者还引用香港作家倪匡的话：“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去是一个假人，萧峰完美，看来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该文指出，按说完人只是无法真实存在的理想，更容易被写成假人，然而恰恰相反。论者引证金庸研究专家陈墨的评说：“我们可以称郭靖为天下第一大侠，而萧峰则是天下第一英雄。其间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后者则是一种本色的真实性格；前者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楷模，而后者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形象。”¹²⁾继而，论者分析指出，“在金庸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存在着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两副笔墨。作家有多副笔墨不稀奇，但通常是为了驾驭不同的题材或体裁而刻意为之，使之都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金庸的情况却是使用在同一体裁中造成了人物形象艺术效果的高下不同，这不可能是有意为之，他的创作理念一直很明确：‘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作家绝非有意要写‘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而不惜牺牲艺术效果，更像是一种潜在心理不自觉地发生了作用。那么究竟是作家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了两副笔墨的出现呢？……作为学术界最为重视的一位武侠小说家，金庸小说的特出之处则首先不是在于艺术品质，更大程度上是在于作品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这份理性思考的存在，决定了金庸小说能如此容易地被纳入专业研究视野，如此容易地被人用既有的话语系统言说。这是因为，在这份理性思考的背后，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一致性——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心态上的一致性——根深蒂固的‘济世之心’。”¹³⁾

以上研究论文的分析，细致地道出了金庸与“现代文学”在创作传统上的高度一致性。正在这种创作上的社会功用性，决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方式在“启蒙者”与“艺术家”之间内在的动力与矛盾，而这正是“文学现代性”在整个20世纪所表现出的普遍创作心理。

12) 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艺术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

13) 关士礼，《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金庸儒家英雄”塑造成败论》，《名作欣赏》，2006 (9)

2. 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

如果说金庸武侠小说表现了“人的现代性”和创作思想的现代性方面的进步动力的话；那么他在其创作中也同样深刻地表现了与这种进步的动力背道而驰的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在其武侠小说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浪漫世界的美好构想，充满一种现代化的人文理想。然而，小说中同样存在的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性则更见深度。社会历史一贯在文明化的进步与野蛮性的毁灭中交叉更替，而理想化的愿望与现实的历史发展总是不相符。作家深感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中的悲剧性伤痛，所以，他的小说中不再有传统的“大团圆”式的结构，而是充满着“大悲欢”的开放式结构。作品中弥漫的不是偶然性的悲惨腥气，而是必然性的历史悲剧氛围。比如《天龙八部》中宋辽民族的争斗让许多无辜的人民惨遭掳掠和杀戮，上辈们的阴谋和仇怨让多少武林人物惨遭杀害，而有着盖世武功和非凡魄力的乔峰却无力平息这一场场恩怨仇杀，甚至连自己心爱的人也失去了，最终在雁门关悲壮地自尽；《笑傲江湖》中围绕武林争霸也展开了一场决绝人寰的殊死争斗。不管是任我行的狠，岳不群的阴和左冷禅的毒，最终也只是伴随着多少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毁灭于江湖；就连《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和苗人凤，虽然同为正义的侠士，也必然要在父辈的恩仇当中寻找一条无奈的悲剧性归宿；其他一些作品中也同样描绘了一场场民族矛盾和武林纷争。作者正是在这些不可避免战争、杀戮中领悟到社会历史发展中厚重的悲剧感，并升腾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对于人性的阴暗面及社会民族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融注了他本人对20世纪的中国现代命运的深度反思。“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也遭受了空前的挫折。惨绝人寰的两次大战、核军备竞赛、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人口爆炸……人和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挑战。二十世纪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同之处。”¹⁴⁾自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强制性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尽管她一直焕发着历史进步的新声，但更多的是接踵而来的历史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悲剧性的后果，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无力阻挡的，从而也导致人们对现代化社会进程的怀疑和批判，而把内在的文化祈求指向了传统文化母体，寻求着一种精神的慰藉。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谈到：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这足以使我们去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安全的社会秩序。当然，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体”终结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比断定“历史无前景”更复杂。¹⁵⁾

金庸武侠小说深深地流露了现代人的这种现代悲观情绪。其武侠小说的悲剧性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高度认识。王文彪在《金庸小说的多重悲剧内涵》一文中分析金庸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具有多重内涵的悲剧描写：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环境要素以渲染悲剧气氛，让人物从命运、爱情、性格、人性诸方面去演绎悲剧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独特性情节设计形成双重悲剧；“假喜剧”的悲剧形式的选择。这些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对悲剧本身的突破。¹⁶⁾ 杨伦也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该文还探讨了金庸作品中人性悲剧的产生根源、表现形态及其包涵的文化意蕴，并评述了金庸为人生苦难指出的解脱之道。¹⁷⁾

14)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5)

15) [英国]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P6、9

16) 王文彪，《金庸小说的多重悲剧内涵》，《榆林学院学报》，2003(4)。

17) 杨伦，《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悲剧》，《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确实，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金庸经历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争苦难，也感受到了香港这块土地上自近代以来发生的所有伤痛。故他在武侠小说创作上连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深厚的思想资源，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并融会贯通，以此来实现对悲剧性的现代历史的批判。如在写到成就武学时，段誉、令狐冲等都是在无意中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而鸠摩痣和岳不群之流却在处于积虑地谋取武学秘诀，导致走火入魔，人性畸变的下场。这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无为”、“天人合一”的至上精神对峙刻意索取、谋求功利的实用心态，批判性指向尤为鲜明。金庸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的人生态度和佛道的哲学精神，让它鲜明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精神血脉中，以此来完成对理想式的“现代人”建构的想像模式。

三、结语

笔者从“人的现代性”、创作思想的现代性以及小说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两个方面论证了金庸小说中的两种现代性。小说中反对的是传统社会制定的一切正邪、善恶、恩怨标准。反对任意杀戮，“快意恩仇”，对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标准提出质疑与反思。从创作方式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单纯地通过书写人物性格来诠释现代人的观念，以古典式的人物外表配上现代人的内在性格。总之，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皈依，以及对社会历史的悲剧性体认，在某种程度上正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契合。如同样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深层认同，同时又对传统中国在现代化的缓慢进程中所发生的历史运动潜藏着深刻的批判，真实地呈现出一幅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图景。在情感上归依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和谐与质朴，理智上又透露出历史进程中的阵痛与悲切。这种饱含悲凉与质朴风格的史诗性作品，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真实面貌。

参考文献

- [法] 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P33.
-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刘登翰, 《香港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P272
- 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
- 吴秀明、陈择纲, 《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 《杭州大学学报》, 1997 (4)
- 严家炎, 《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4).
- 袁杰, 《试论金庸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4 (1).
- 宋伟杰, 《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赵跃鸣,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金庸小说》, 《保山师专学报》, 2005 (6).
- 唐杰, 《金庸笔下黄蓉形象的文化解读》,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墨, 《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艺术论》,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关士礼, 《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金庸儒家英雄”塑造成败论》, 《名作欣赏》, 2006 (9)
-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1985(5)
- [英国]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译林出版社, 2000, P6、9
- 王文彪, 《金庸小说的多重悲剧内涵》, 《榆林学院学报》, 2003 (4).
- 杨伦,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悲剧》,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
- 胡小伟《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市100732)2005.5
- 李春敏《浅谈现代性及其超越——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述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010.7

〈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the Martial arts novels of Jin Yong
and the two “Modernity” consciousness

Wang Le

From the Modernity of Man, the modern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modern novel of social criticism of two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d two kinds of modernity in Jin Yong 's Novel. It against the formul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standard which are the good and evil, grudge standards. Against arbitrary killings, “Willful hatred”, and questioned to the thousands of years challenge traditional standards and reflection.

About the way of the creation perspective, Jin Yong's martial arts is not just Characters in writing to explai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modern, and classical style of the characters appearance coupled with the inherent character of modern man. In short, the Jin Yong novel is the conversion of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to realize the tragic social history, which is a deep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ppear in the slow proces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riticism, presents a pictur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ruly.

Key Words : Martial arts novels of Jin Yong, Modernity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